

# 新思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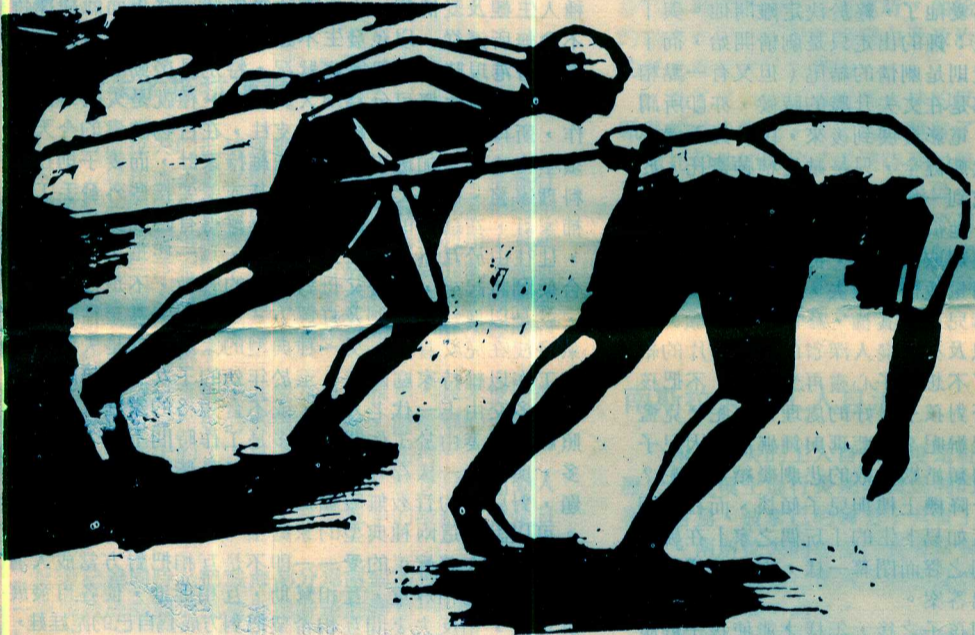
月刊

## NEW CURRENT

第十二期 每份一元

一九八〇年六月一日

### 紀念五、一勞動節



「我們維護那弱小的、維護那無助的、維護那被壓迫的；我們要那做錯了事的人作出補償；我們要給無知的人以知識和智慧；我們要解放奴隸！社會主義要保證全人類的福利……」

美國工人領袖阿伯特·帕森斯在法庭上的自辯詞。



### 鐵托與南斯拉夫革命

### 克藍馬得回孩子後怎樣？



# 克藍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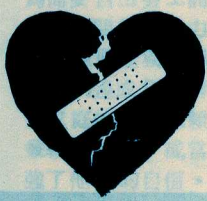
## 得回孩子後怎樣？



一部反映美國當前家庭糾紛，而榮獲本屆奧斯卡五項金像獎的電影——「克藍馬對克藍馬」在港公映了。由於來看的觀眾十分擁擠，以致必須預購戲票。起初筆者亦是慕名者之一，而且以為一部只是反映美國社會現況的影片，在香港這個還受封建倫理觀念嚴重影響的中國人社會，根本不會如廣告宣傳那樣能「賺人熱淚，感人肺腑」的。但是，剛巧相反，當我看到克藍馬（以下稱戲中的孩子父親為克藍馬，母親為鍾娜，但讀者要注意，電影的中文旁把父親名字譯作嘉瑪）敗訴後，他對兒子比利說出要彼此分開，以及在與比利離開那天早上做早餐的情況時，我竟情不自禁地飲泣起來（如果不是自尊心的驅使，我真想縱聲大哭，正如在劇情開始時，鍾娜走後的次日早上，克藍馬與兒子弄早餐的狼狽情景會使我縱聲大笑一樣）。我之所想大哭一場，並非為克藍馬要離別兒子而難過，恰恰相反，直至劇情發展到那時之前，我都一直在笑，在恥笑克藍馬的狼狽相，或確切地說，是恥笑以克藍馬為代表的、在美國高度競爭底下形成的、以「個人事業」為而不顧一切向上爬的「大男人主義」作風。當劇情發展至父子依依不捨，特別是兒子問父親誰人還會每晚講故事給他聽時，我不覺為這個無辜小孩再次受離別之苦而不禁悲從中來。事後想起來，我想大哭一場，這是由於我覺得無論克藍馬還是鍾娜，都不是把兒子當作人看待，而只是當作一件寵物、一個心愛的泥娃娃，必須據為己有而後快，而不理會孩子所受的精神痛苦。可幸最後還是鍾娜理智，體諒孩子的苦處，放棄自己的權利。

看完這齣電影使我聯想起另一個劇作品，一位十九世紀後期的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一個「社會問題劇」——「玩偶之家」（二十年代譯作「傀儡家庭」，現在還可以買到的小冊子是由國內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文學小叢書，一九七八年版，由潘家詢譯的，書名是「玩偶之家」）。兩個不同形式的作品，面世的時間剛巧相隔了一個世紀（易卜生在一八七九年發表「玩偶之家」），却不約而同反映了同樣令人（尤其是年青人）關注的社會問題；其中問題有：怎樣的婚姻才不是失敗的？男女的結合應以什麼為基礎才能夠幸福恩愛，以避免因家庭破裂，而令下一代受害？家庭應以個人事業還是愛情為重？還有：婦女應否有自己的事業？

在易卜生的劇中，主角娜拉，平時受丈夫海爾茂呵護備至，愛稱她為「小鳥兒」、「小松鼠兒」；但是一旦海爾茂發覺她做了一件錯事（這錯事就是娜拉冒簽她父親的名字向別人借一筆錢，而這筆錢正是用來為海爾茂治病的；後來債主却利用娜拉的錯誤，要挾海爾茂答應債主的要求。）便一反常態，認為她這個錯誤把他的一生幸福全部葬送，並罵她是「下賤女人」，並且不能再交孩子給她。後來由於收到債主寄來那份冒簽的借據，海爾茂再不要向他認為卑鄙的債主讓步，事件也就平息過來，那時，海爾茂立即又轉變態度，饒恕娜拉，並且說要「像保護一隻從鷹爪下救出來的小鴿子一樣」保護她，要她重新作他的「孩子」、「小鳥兒」、「小寶貝」、「私有財產」。但此時，娜拉已清楚認識到與自己相處八年的丈夫的真面目，亦認識到自己一向以來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只是個泥娃娃。丈夫愛什麼她也愛什麼，或假裝愛什麼，正如她從前是父親的泥娃娃一樣，跟着父親的意見走，不敢提出自己的意見；而孩子亦是她的泥娃娃。而且感覺到那時才是他們八年來第一次「真正正經」的談話，他感到不再愛她了，過去只不過「跟一個生人同居了八年」，而且認為不能在生人家裡過夜，當晚就決定離開海爾茂，和鍾娜一樣拋開一切，隻身離開。當海爾茂在挽留她時說：她不應扔下她「最神聖的責任」——即「對丈夫及兒女的責任」；而娜拉的回答則是：她還有「別的神聖的責任」，就是對「自己的責任」——「即學做一個人」，而且說她開始「不能一味相信大多數人說的話，也不能一味相信書本里的話」，要重新思考，「要用自己腦子想一想，把事情的道理弄明白」，要弄清楚究竟社會對還是自己對。當海爾茂解釋剛才自己態度的轉變時說：「娜拉，我願意為你日夜工作，我願意為你受窮受苦。可是男人不能為他愛的女人犧牲自己的名譽。」娜拉則作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回答：「千千萬萬的女人都為男人犧牲名譽。」（以上所有引號內的文字均出自上面提及的那本「玩偶家庭」的小冊子。）



在「克藍馬對克藍馬」（以下簡稱為影片）中，鍾娜的出走可以說與娜拉大同小異。鍾之所以有勇氣拋棄棄子出走，不是由於丈夫虐待她，對她不忠，不給家用等等，而是由於丈夫只要她作他的「妻子」，而鍾並不是那種人。她一直相信女人和男人一樣應該有自己的事業；五年多來她曾屢次向丈夫提出到外邊工作，而遭到丈夫的拒絕，並認為她所賺到的薪金不夠用來請人管理孩子。結果，在丈夫不理會她的心境，而只埋頭於他自己個人事業之中的情況下，鍾覺得在丈夫身邊毫無作為，甚至懷疑自己存在的價值；不但對丈夫沒有用，還認為孩子沒有她還更好，甚至想自殺（正如娜拉在知道債主主要向她丈夫揭發她的錯誤，已經預先知道丈夫不會原諒她而曾一度打算自殺一樣），一句話，感到與克藍馬相處十分痛苦，因而不愛他了，終於決定離開他。與「玩偶之家」不同之處是：鍾的出走只是劇情開始，而「玩偶之家」的娜拉出走則是劇情的結尾（但又有一點相同的是：她們的出走都是在丈夫升職的時候，亦即所謂事業有所成的時候）。電影發展到後來，由於鍾看過心理醫生證明自己精神狀態健全，只是缺乏精神寄托，於是她根據自己所長，找到一份高薪職位（比前夫年薪高出許多），恢復自信。她很懷念與自己日夕相處了五年多的兒子，於是向克藍馬取回孩子，但由於克藍馬不諒解她的出走，不肯與她商量並憤然離去，因而鍾不得不與克藍馬對簿公堂，與他爭奪兒子撫養權，終於得償所願，獲得勝訴。最耐人尋味以及亦最發人深省的就是影片的結尾，鍾娜最後還是為了不想孩子心靈再受創傷，不把孩子帶走，但是，這是否對孩子最好的處理方法呢？克藍馬得回孩子之後又怎樣辦呢？克藍馬與鍾娜能否因兒子而復合呢？怎樣避免同類婚姻失敗的悲劇繼續重演呢？影片只在鍾娜單獨乘升降機上樓與兒子傾談、而在機門關閉的一刻中完場，正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娜拉走後樓下傳來一下閉門之聲而閉幕一樣，編劇兼導演的羅拔·班頓並沒有作出答案。

究竟克藍馬在得回孩子之後，怎樣才能使孩子健康地成長，而又不妨礙到個人的事業發展呢？依筆者推想不外有兩種可能：一就是克藍馬再娶一位「賢妻良母」型，即如娜拉所說那種肯為男人的名譽而犧牲的女性，安於在家做克太太、為克先生好好照顧兒子比利，好讓克能專心一致去發展他的「個人事業」。可以說這種可能是有的，但在美國社會已經逐漸削弱了。這是由於婦女的覺悟程度已大大提高了；自從二十世紀以來，隨着工人運動的發展，佔工人階級人口半數的婦女亦動員起，發展成獨立的爭取平等權益的婦解運動：如男女平等受教育、就業、同工同酬、選舉等權利，而且還爭取到墮胎合法化、有薪分娩假等。這一系列的成就，使婦女恢復了自信，體驗到自己並不是無能為力，而是極具潛力的人。娜拉那個時代的婦女形象在這些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內，可以說是「難以復得」的了。越來越多的婦女不再甘心於做男人的「煮飯婆」，而要求有自己的獨立事業，獨立的人格和命運。依筆者看來，假如克藍馬態度不改變的話，他是再不容易再娶一位傳統女性的了。

另一種可能就是：克藍馬在鍾娜走後的一年多中，由於要照顧孩子、打理家務等，以致事業上大受打擊，最後竟被老板開除。經過了這些風浪後，他認識到家務勞動、照顧小孩等工作，無論由妻子或是分散到每個家庭的成員來分担，都必然束縛着家庭各成員的個人才能的發展，亦即個人事業的發展。現代文明的高度發展，已經使家務勞動社會化成為可能了。由社會負起家務的責任，通過提供公共食堂、洗衣場、托兒所等等設施來解放家庭成員，已經成為婦女運動的奮鬥目標。於是，克藍馬基於理解到個人專長與事業的發展，與社會制度的改善有着密切的關係之後，開始走出個人小圈子，轉而支持並投身到爭取婦女解放——即要求政府負起責任，使家務勞動及照顧兒童成為社會福利制度——的運動

中去，並將個人專長、個人事業的發展與這些運動的發展連系起來、統一起來，成為自己的事業的一部份或全部。於是，在具有上述的人生目標——即以促進人類解放事業的發展為生活目標——的情況下，也理解到婦女亦應該有自己的事業；而男女雙方的結合必須建基於有共同的人生目標，以從事共同的事業作為連系基礎，只有這樣，才能在人生道路上互勉互勵、共同進退，才有幸福。在排除了以往的狹隘思想後，與前妻鍾娜在上基礎上復合，在事業上互相支持，並肩前進；而且將兒子放到托兒所中，讓他不再依賴父母，而能在同輩的小朋友的小團體生活中，獨立發展自己。

筆者提出上述的兩種可能，其實可以說是兩種不同的人生觀和兩種不同的愛情觀。青年人應確定接受哪一種人生觀及愛情觀，才能在往後生活道路上面臨抉擇時不會無所適從，以免發生不必要的家庭悲劇；讓我們先看看香港現時的一般家庭狀況，特別是勞動階層的家庭狀況吧。這大概可分為兩大典型：一種就是丈夫外出工作，所得薪金是家庭經濟的支柱，在百物騰貴的今天必須早出晚歸、加班工作，才能維持家計，而妻子則在家料理家務、服侍丈夫、兒女，甚或還要接些外發手工幫補家計，在這樣的家庭里，夫妻難得有時間作坦誠商談，往往由於互不理解對方的苦處，為一些瑣事或一言不合便鬧將起來，至於父母對子女的管教，不是任其自然，就是以傳統的禁制及打罵方式對待之，甚至往往將悶氣發洩在兒女身上。另一種典型的家庭，就是夫婦均外出工作以維持家庭開支；至於年幼的子女，由於經濟問題，多交由上一代老人家，或是不合規格的家庭式托兒所照顧；夫妻由於工作關係，多是工作時間不同，聚少離多，與前者一樣存有隔膜，談的多是柴米奶粉之類的問題，對兒女的管教無暇顧及，或與前者一樣以打罵解決。可以說，這兩種典型的家庭里，夫妻、父母子女間根本沒有存在着真正的愛——即不是互相把對方當成人看待，不是互相尊重，互相幫助，互相促進，使各自發展其專長，相反夫妻間互相希望把對方成為自己的泥娃娃，父母希望子女成為自己的泥娃娃，而子女由於沒有經濟能力，只是陽奉陰違，力圖擺脫變作泥娃娃的處境，經常與上一代對抗；在這兩種家庭裡，夫妻不和、家庭不和，縱使不會像克藍馬夫婦那樣會對簿公堂，但也常有丈夫毆打妻子、父母虐待子女而鬧上警署的事件發生。其實，做成這種情況，正是由於這個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那大部份的社會財富——資本——集中於一小撮大老板手裏，他們為了要獲取更高的利潤，必須要將出賣勞動力（無論是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的人都變成他們的泥娃娃。所以，我們青年人應該，而且有需要確立這樣的人生觀——即以改變社會的不合理、使人變成泥娃娃的制度，並以爭取能發揮個人創意的社會制度的到來作為自己的事業，並以此作為男女相愛的首要條件，作為男女結合的主要聯系；即能使你和你的愛人由於有相同的人生目標，能夠以共同的事業，才不致被上述兩種典型的家庭繁瑣所束縛，與你的愛人在往後崎嶇的人生道路上，互勉互勵，各自發揮其所長，以便共同對整個個人類獻出一份力量。

有了人生觀及愛情觀，當然並非能夠完全解決實際問題；就算確立了筆者所贊同的人生觀及愛情觀，還不能保證你完全擺脫上述兩種典型家庭的束縛，但却可以作為指導，使你不至無所適從，從而而有毅力有信心去爭取筆者所說的幸福生活，美滿婚姻。筆者希望藉此文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以期引起關心同類問題的青年朋友、讀者，提出不同意見，一起來討論這類問題：青年人究竟需不需要有人生觀及愛情觀？應該確立什麼樣的人生觀及愛情觀作指南，好使生活能更充實、婚姻能更美滿？以及其他有關愛情、婚姻、家庭、人生等一系列問題。

# 鐵托與

## 南斯拉夫革命

曼德爾

譯者：方子



鐵托乃斯大林之前的共產主義運動，第一輩代斯大林主義領袖中最後生存着的一個。那個輩代經歷了共產國際從一個圍繞着她的綱領，推進世界革命的組織降低為克里姆林宮底外交工具的轉變。鐵托表達了那個輩代底令人痛苦的矛盾。

他名符其實地緊隨着共產主義的開始。他希望在國內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但同時，他却盲目地效忠蘇聯的領導，將它等同於國際共產主義。這個不可解決的矛盾做成了表里不一的兩重性和犬儒主義。

當斯大林藉着派系鬥爭絞殺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時，鐵托接受了斯大林交給他的領導權，以重建南共。為了酬答斯大林的恩惠，他默許了蘇聯對他幾位最親密同志的殺害，他們都是一些南共中有威望的人物，如前任總書記米蘭·佐奇。

### 南斯拉夫的抵抗運動

南斯拉夫的抵抗運動

可是，鐵托並不是克里姆林宮指令的一個簡單執行者，或者是一個奴隸性的侍從。一九四一年，當德國和意大利的帝國主義者進攻南斯拉夫時，鐵托利用了資產階級國家的進一步腐敗，小資產階級的政治混亂，先進工人、學生希望剷除那些做成國家受到超級剝削的兇徒的願望。他發動了一次羣衆性的反帝起義，最後發展為一段真正的英雄傳奇。

那支開始時只有數千共產黨員的義軍，後來發展成與世界最強國軍隊作戰的英雄武裝，游擊軍的人數多達三十萬人。廣大的工人羣衆全被包括在內。

儘管存在着無可否認的官僚操縱，以及用以煽動人心的、過激的民族主義，這次解放戰爭的階級性質是日益清楚的。

反帝起義同時是把城鄉劃分為兩個不可調和的陣形——剝削階級的陣形與被剝削階級的陣形——的一場內戰。

因此，鐵托和南斯拉夫共產黨，是在被佔領的歐洲中，唯一完成了革命馬克思主義任務的：把反對帝國主義壓迫和超級剝削的羣衆運動轉變為一場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粉碎資產階級的權力、財產和國家。

斯大林並沒有忽略這個事實。他嚴厲地批評南斯拉夫游擊軍中無產階級兵團的建立。他同時批評意大利、德國、保加利亞、匈牙利軍隊廣泛地招募戰俘和開小差的逃兵。他責備鐵托以他的「極端主義」政策危害着蘇聯與英國及美國帝國主義者之間的鞏固同盟。

爲了給羅斯福、邱吉爾幫一點忙，斯大林強迫鐵托接受一個暫時的政治妥協，容許資產階級部長留在聯合政府中。斯大林還強迫鐵托同意以全民投票方式來決定是否需要君主獨裁這個問題。

但它們全都沒有功效。內戰發展的深刻，羣衆動員的廣泛，和作爲革命動力的游擊軍的鞏固，都不容許資產階級秩序的重建。一九四五年的全民投票後，資產階級國家的剩餘都給清除去了。資本家的財產很快便被充公。社會主義革命在南斯拉夫勝利了，一個官僚主義的畸形工人國家因而也在該國建立起來。

### 反抗斯大林的勝利

由於這個原因，與蘇聯官僚層的衝突便無可避免了。斯大林，按照他一向的態度，只有一種思想方法。一個逃離了克里姆林宮控制的共產黨，儘管它在思想上與

方法上經已斯大林化了，也是整個官僚主義堡壘的一個缺口。通過這缺口，所有的「怪物」都會鑽進來。因此，必需對付、肅清這些異教徒。共產情報局便是作這個用途的。一九四八年，南共被逐出共產情報局。

可是，由於鐵托和南斯拉夫的共產主義者是靠自己的力量來建立政權的，於是提供了成功地反抗斯大林的物質基礎。他們成爲第一批成功的反對者，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權力上。

儘管實施了經濟封鎖，企圖煽動暴動，甚至暗殺；儘管蘇聯軍隊兵南斯拉夫的邊境，南斯拉夫的第二反抗，一如第一次那樣，終於成功了。

一九五五年，當克魯曉夫抵達貝爾格勒機場，並公開地爲七年來，由臭名遠播的莫斯科宣傳機器高唱的反鐵托誣蔑和侮辱作出道歉時，他給南斯拉夫共黨老一輩的領導作出一定程度的辯白及政治上的勝利，這在蘇聯的歷史裡是史無前例的。

爲了成功地組織對斯大林的反抗——這個反抗有着顯著的進步作用，並正式地開啓了斯大林主義的危機——鐵托和他的同伴必需同時發展最廣泛的羣衆基礎，以及爲那超過一時的反抗提供一個理論的和政治的基礎。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推翻了從前的強迫性農業集體化，並採用了工人自治的制度。

南斯拉夫的共產主義爲一個口號所代表：「工廠歸工人所有，土地歸農民所有。」

### 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

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趨勢在歷史的規模上進行長期自我批判的有力顯示。這個趨勢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序言中被馬克思預見了。南斯拉夫的制度代表着蘇聯自從在斯大林的獨裁統治下，一個業已鞏固了的制度的改正。可是，它只是一個局部的改正而已。

首先，它是由官僚的一翼從上施予的。制度裡相繼的轉變基本上是上級發動的結果，雖然這些上級發動與工人階級的運動有着日益顯著的相互關係。

再者，這個制度包含着一個基本矛盾。僅僅局限於經濟領域的自治，（而且還局限於單個企業），由於南共壟斷了政治權力，往往失去它應有的力量。官僚層在經濟平面上被削弱了，因而他們能在政治平面上補償它。

根據卡爾德吉，鐵托主義的第一流理論家的說法，政黨是「在根本上」與自治制度互不相容的。這至多也不過是把「一黨專政」合理化的詭辯而已，雖然他們把它喚作南斯拉夫共產主義同盟，而不喚作黨。

南斯拉夫的經驗證明了，（以反面的例子來證明）第四國際的綱領。沒有民主選舉的工人議會來掌握真正的政治權力，便沒有真正由工人階級執行的經驗和政治權力。沒有多黨制，沒有給所有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工人議會並不會有真正的權力。

### 已得的成果和它的局限性

甚至在經濟平面上，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的局限性還是很快地出現了。由於現時的生產力水平，還無可避免地要進行集中的經濟決策。可是，南斯拉夫的領導拒絕建立民主的與自覺地集中的，得以行使最高權力的工人代表大會。換言之，他們拒絕把自治制度提高至那能夠有效地及合理地決策的水平。

他們拒絕這種制度，並不是由於要繼承共產主義的傳統學說，只是因爲他們作爲作爲官僚的一翼，他們希望不惜任何代價來防止工人階級掌握決策的權力。工人階級的分崩離析和分化，是官僚維持權力的先決條件。

由於這個原因，在上層的避免權力集中，也或多或少地再出現於下層——通過市場和競爭。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以它顯著的經濟、政治及社會矛盾日益溶入「市場社會主義」的神話中去。一九六八年至七二年的危機把這些矛盾帶到頂點，尤其是那真正「爆炸性」的廣泛失業和社會不平等，以及回到在社會主義經濟的毛孔裡榨取資本的原始累積。

雖然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是官僚層一手做成的，而且充滿着瑕疵，但相對於斯大林建立的，並移植到許多工人國家去的官僚統治，無論如何是走前了一步。

它主要的好處是，給工人階級提供較大的自衛餘地。在南斯拉夫，工人階級罷工、示威的數字、工人民主的程度，都比其他工人國家爲大。

當然，這遠遠還不足夠。他們還對異己份子，（包括那些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實行政治迫害，他們經常犬儒地否認跟自治制度相近的原則，好像當他們迫害布爾格勒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授的時候。

但那個迴旋餘地却是真實的。南斯拉夫的工人經常自誇說，他們的國家是世界上唯一出現經理不能踢走工人，相反，工人可以踢走經理的地方。這還不是社會主義，甚至不是社會主義民主，可是，雖然這樣，成就已不少了。

### 鐵托死後的南斯拉夫

由於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的矛盾，鐵托之死將給南斯拉夫政府帶來一次深刻的震動，許多力量在運動着，並以相對的自主性運動着。許多互相衝突的社會和政治流派公然地宣傳着他們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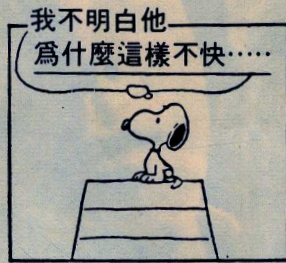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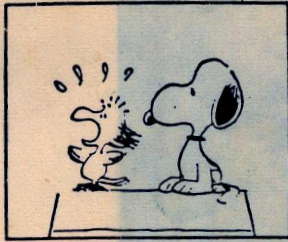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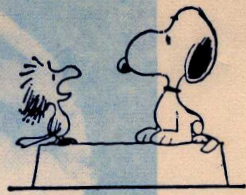
在這個有着不同民族的國家里，深刻的社會不平等使民族之間的衝突更爲惡化。黨的領導，（同時是官僚層）明顯地在民族的界線上劃分開來。在鐵托的波拿巴獨裁統治下，只有軍隊才是相對地團結的。

鐵托死後，一些力量爭取自治的嘗試，以及其他力量相應地要提高集中化，將引致國外的干預。而蘇聯的官僚層，美國的帝國主義者（特別是駐在意大利的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隊）將利用南斯拉夫這次危機，來改變地中海的力量關係。

再者，失去了一個至高無上的仲裁者，將加劇工人階級與官僚中阻礙保障充分就業一翼（他們最後將做成恢復資本主義的趨勢）之間的衝突。

南斯拉夫的馬克思主義者，與國際革命運動必須明白面臨戰鬥的重大利害關係。我們必須不懈地保衛成果，保衛這個工人國家及它的自治制度，反對所有企圖推翻它們的敵人。可是，我們必需以無產階級獨立動員的方法來保衛它，以作爲工人議會掌握經濟和政治權力的鬥爭底一部份，以及完全發展的無產階級民主的鬥爭底一部份。

## 兩種代溝



對年輕人來說，沒有別的東西像代溝那樣親切、那樣普遍了。雖然不是任何一個年輕人經歷過離家出走的傳奇性冒險，但隨便那一個青年都一定會向你訴說他（她）們的父母親如何如何不理解他（她）們、如何如何要強迫他（她）們服從命令、等等。問題的癥結都在於：父母所相信的、兒女不相信；而兒女所以為的、父母又認為大大不行。但這還不是代溝的全部。要害的不是子女要強迫父母服從他們的意志，而是父母要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強行塑造他們的兒女。於是一場輩代間的戰爭便告開始了。

我自己也曾經參與過那樣的戰爭——只是冷戰居多而已。我記得自從我在七一年參加了保衛釣魚台運動以來，我和父親的衝突真是既廣且深。後來雙方都厭倦了，因為彼此始終分不出勝負。於是彼此都用了冷戰的戰術。而父親在這方面簡直是高手，他常常在我的書簿上寫些歪詩來罵我。有一首我還記得是這樣的：「西歐新潮向東流、父子兩代有鴻溝、自由反叛方時尚、髮膚血統也不留。」對於這些「高招」，我簡直無力抵擋，最後只有落荒而逃——離開家庭。

讀者們有興趣的當然不是什麼個人經驗，而是做成代溝的一般原因。既然這個問題是社會性的，它的解答也自然只能從社會的角度——不是從個人的角度——來尋找。

代溝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怪物。它把倫理關係分裂成兩大陣營：上了年紀的和青一輩的。但是，什麼因素使人際關係沿着輩代的划分而分裂呢？我想那是由於社會的經濟、文化、科技的急劇發展。一個較為停滯的社會制度——例如封建社會、輩代衝突的可能性是極低的。立足在自然的農業經濟上面的農民家庭，它們的成員間要在父權的支配下彼此依賴才能生存，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耕種土地、維持生計。任何一個家庭成員——更不要說是羽翼未豐的青年了——都不可能具有獨立的出路。紅樓夢裡的賈寶玉和他父親的衝突，是極偶然的，而且衝突的根源在於那腐化墮落的地主階級的內部矛盾，而不是別的原因。

然而，當資本主義代替了封建制，而產生了大工業生產，一切都改變了。僱傭勞動制的實行，瓦解了封建家庭成員之間的互相依賴。它們中任何一員都可以獨立地進入工廠、鑛山、鐵路、寫字間工作、獨立地出賣勞力並獨立地領取工資。原有的「帶」破裂了，現代工業因

為需要自由勞工而對一般家庭做成外部壓力，迫使各家庭成員間的離心力更強。於是，兒女對父母的依靠減少了，他們能獨立謀生的可能性大大加強了。即以香港為例，到達成年的青年不用說，即使是一般中學生，他們對家庭的經濟依賴已經越來越削弱了。更多中學生會找兼職、補習、或當暑期工來養活自己。這種半獨立性加強了他們的自信，認識了自己的力量，因而更傾向於獨立地走自己的道路了。

還有另一個因素是不斷加速着那種獨立性的：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科技成就，等等。青年人較有勇氣去接受新思想的挑戰。因為當他正式或不正式地踏入社會的時候，他從上一代承繼下來的舊思想、舊習慣還未根深蒂固，而另一方面他却已經能夠吸入人類文明的最新近的成就。這種新與舊的綜合，使他們能夠以最先進的思潮來武裝起自己，使自己在踏入社會的時候便能替自己建成了一種自衛機能，並以此來引導自己的事業和命運。

然而，當他們懷着自信，身上配備了最新式的思想武裝來向社會衝進去的時候，他們却處處遇到了抵抗。首先，他們發現每一行業的較好的位置，都給上了年紀的人佔住了。人們告訴他們說，這是天經地義的，因為年輕人沒有經驗。上了年紀的傢伙往往就是以這種懷疑的眼光來看待這些新的競爭者，他們害怕會讓他們早已佔好了的好位置給年輕人搶去，於是他們趕緊聯結起來，歌力打擊青年人的野心。於是這些年輕人不能不感到沮喪，對於這種社會不平等感到憤怒，他們開始懷疑究竟這個社會是否像老師和父母所說的那樣美好。他們踏在懷疑的基石上，又進一步摸索出路，於是一些激進的、革命的思潮特別容易吸引他們。可以說，近代歷史的任何一種思潮，如果沒有吸引一大批青年，那就證明根本不會有什麼成就。

當年輕人努力尋找出路的時候，他們發覺到他們的父親並沒有幫他們什麼忙。因為青年人需要新的思想來解決他們所遇到的新的問題。但他們的父親只能給他們開出陳年藥方。他們告訴兒子，耐心地等罷。因為做父親的不是離羣而居的。他們在過去數十年中國社會上許多其他父親一樣經歷着非常艱苦的向上攀登的歲月。當他們回顧他們的過去時，他們所能見到的就是人人躡着在階梯上攀登：後生、小文員、科主任……或是學徒、長工、技工、工頭等等。他們以為人生也就不外如此，

決不能有例外，即他們的兒女也決沒有例外。如果有的話那他就是個謬種，決不能在這個社會生存。但他們不願意他們的兒女不能生存。於是他們拼命要根據社會上通用的做人標準來塑造他們的兒女，要他們緊跟着父母親的腳步，不可偏離這條大道一刻。所以，所謂「父權」，不過是社會上傳統意識的在家庭中的代理人而已。然而青年人不滿於社會傳統意識，更千百倍地不滿於它的在家庭中的代理人。

話分兩頭。如果青年人與父親的衝突範圍僅限於個人事業的取捨，哪麼這種代溝不會延長很久，過不了幾年便很容易和解的了。何以如此呢？並不是父親改變了，而是兒女改變了。年青只是一個很短暫的階段。一旦到了年青的末期，他們會越來越快地溶入社會的等級制，沿着他們的父母輩的步子努力地，一步一步地向上爬。到了那個時候，一方面自己的職業開始穩定下來了，另一方面他發覺到他同父親的分別已經消失了，於是代溝消弭了。法國人有句俗語：「二十歲搞革命，三十歲變混蛋」。具有革命傳統的法國民族，是深明此中道理的。

只有一種代溝，它的消弭是遙遠的，父子間的和解是很少可能的。這就是當年輕人在摸索的過程中，不僅找到了個人的事業的前途，還找到了社會的前途，於是他們的思想、行為便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徹底地懷疑了社會制度本身，並且不認同於它，還努力於建立另一種更合理的社會。這種反叛的範圍，已經大大超過了個人的小圈子，而達到對整個世界的否定了。他已經不僅否定他父親所代表的傳統人生觀，還否定他父親所立足的那個制度。到了這時刻，這種代溝在內容上已經有所變化了，和解自然很難了，因為彼此在人生道路上已經根本分歧了，大家不能不背道而馳，各奔前程。巴金的小說「家」裡的主人翁，便是為了追求更合理的社會，而衝出家庭的典型。七十年代初的香港，也不知有多少青年是沿着巴金所描寫的「路」前進。

由這樣而引起的代溝，既深且廣，然而却又是青年人憚於前驅的反映。這種跳出了個人小圈子，而企求整個人類幸福的理想，才能使人不枉此生，才能夠真正渡過充實的、幸福的人生歲月。我們不必以存在那樣的代溝為可惜。

劉宇凡

## 被遺忘的五、四

林偉

香港人很重節日的享樂，大小節日，無論是中國的還是西方的，都有着大量的玩樂，以歡渡他們的假期。相反的，那些並沒有耍樂的意義的日子，並不引起人們的注意，他們也許忘記了，也許並不認為這是有着什麼意義的日子，沒有假期，沒有節目。

五、四紀念日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無聲無色地過去了。

本來，要紀念一個日子，不一定要什麼樣的儀式，或特殊的形式，但恐怕，即使在這個日子裏，去思考一下它的意義的人，也是很少的了。

五、四的最大意義，在於它代表了當時中國人民的反帝國主義情緒。它是一個標誌，顯示了中國人民自滿清政權滅亡前的幾十年，遭受了英、美、日本等帝國主義的無數壓迫、掠奪，而最終反抗起來的。

工人、學生、小商人，用他們的行動，向帝國主義者和奴顏婢膝的軍閥政府，表示了他們的覺悟和反抗的決心。儘管受到了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共同進攻，他們仍勇敢地鬥爭下去。

一九一九年的凡爾賽和約，其中關於將德國在山東的主權「轉交」給日本的條約——那是五、四運動的爆發點——軍閥代表們由於恐懼人民的更大反響，終拒絕在上簽字。這是人民的一次勝利，雖然是局部的。這是帝國主義者的挫折，他們往後還要遭受更大和更徹底的挫折的。

我們要紀念五、四，因為它的精神和今天的香港，有很大的關係。

今天的香港，仍是在英帝國統治下的殖民地。種種的不平等和壓迫，正由少數人組成的港英政府，加諸人民身上。

也許殖民地主人由於受過挫折，吸取了教訓，它的統治已不像過去的血腥和赤裸；也許香港人一般都有不太差的生活水平；也許他們也有不滿，但他們總有比國內人民更高的生活條件，因此他們也不作太多抱怨……總而言之，我們會看到，大部份的香港人，他們一般的政治願望，是維持現狀。對於殖民地統治的不合理性，他們尋求解答或改變的意願，是如此驚人地薄弱。

香港人特別要認識五、四精神。他們要知道，殖民地統治者和人民之間，必因彼此對立的利益而爆發衝突。前者要維持對殖民地人民的盡量掠奪，以緩和宗主國由於經濟和政治危機所引起的種種問題。而後者，則要保衛基本權利或改善生活待遇。兩方面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宗主國掠奪殖民地，可以給本國的人民一些政治或經濟上的利益，以緩和人民對統治者的不滿情緒。所以，英國人民還有形式上的民主選舉，香港人民只有委派的立法行政議員；英國工人還有罷工的權利，香港工人連集會的權利也被諸多限制。

在香港，英國人與大部份中國人之間的不平等也是很明顯的。

政治上我們固然沒有權利。部份的英國人立法、行政，我們只能遵守，他們只讓我們「溝通」，却沒有絲毫干預的權利。

大部份中國人連運用母語的權利也沒有，所有公文

、學校的教學，以英語為主。不懂英語，意味着你會損失在就業上、就學上的很多機會。作為一個工人，他可能連那些勞工法例對他有利益或有害都不知道，因為這些條例是由英文寫成的。

其他如生活上的不平等。譬如曾經引起一些市民抗議的居住問題。公共房屋由福利變成政府的牟利手段。一個人要等待七至十年的時間，以獲得公共房屋的分配。但少數的英國人，就像幾十年前各國在中國的「租界」一樣，有他們獨有的寬敞、舒適的居住環境。

又如教育，一個學生，現在要在中三時候就進行考試，去決定能否完成中學課程。但英國人的子弟，都有特殊的學校、設備完善的教育設施，完全不必受到重重考試的壓迫，他們有異於香港學生的教育制度，他們有完全免費的中學教育。

整個社會充滿着比這更多的對立，這些事實極之晰地放在我們的面前。要獲得解決，只有結束英帝國的統治。

五、四運動雖不曾直接造成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被覆滅，但它指出了道路，指出了人民，只有他們自己的力量，才能反攻這種種壓迫。

五、四運動也不是突然地爆發起來的。人民也經過一段時間的受矇騙，忍氣吞聲，才最終找到出路的。

現在是認識這些事實，這個意義的時候了。五、四精神，在香港，應以新的內容延續下去。